

儒学在 21 世纪还有戏吗，怎么唱？

林安梧*

恭喜《当代儒学》创刊十周年，刚刚杨永明院长很清楚地叙述了这个过程，让很多网上的朋友可以因此更清楚。黄玉顺教授又谈到了怎样看待当代儒学，他提出了三大点，讲得非常透彻。

我联想到，21 世纪儒学还有戏唱吗？这个问题是我在台湾的时候，一些年轻朋友问我的。我自己参与的所谓当代儒学，是先参与以“鹅湖学派”为主导的，上溯到唐、牟、徐三位先生，再往上上溯到熊十力、马一浮与梁漱溟几位先生的。刚刚黄玉顺教授大概是把它归到所谓的现代儒学。它现在产生了当代儒学，其实是包蕴到所谓现代化之后，后现代的重新反思的一个儒学，而且有它的当下性。原先的现代儒学，唐、牟、徐几位先生，他们也有那个年代的当下性，但随着时代的变迁起了很大的变化。

我大概在 20 世纪的 80 年代末期开始比较强烈地感受到这个问题，然后在 90 年代开始反思。也因此造成我们《鹅湖》内部发展上有一些不同，一是坚守着一个论题：“儒学如何走入现代化？”我现在觉得问题已经不再是儒学如何走入现代化，当然这个部分还是有，现在更重要的议题是：“在现代化之后人类的文明该当如何？”

另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可以重新反思：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如何走入现代化，这样的思考有着怎样的限制。像牟先生所提出的理论，“良知的自我坎陷”开出知性主体，然后如何融摄现代化。这是它一个诠释学意义上的“理论的逻辑次序”的安排，而在实际上它有一个“实践的学习的次序”与这

* 作者简介：林安梧，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台湾东华大学荣誉讲座教授。

个是不同的。这是我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时候提出来的问题，一直到前两个礼拜，我与我的学长李瑞全教授就此做了一个论辩，李教授比较站在所谓“护教新儒学”的立场来讨论这个问题，比较坚守着牟先生的立场。这与我比较是站在“批判新儒学”的立场是不同的。他对我所提的内圣外王、交与为体，互藏以为体，交发以为用，我借船山哲学立场而说的，他全然不能理解，很是可惜、遗憾。

这里我们必须回溯思考，从整个现代新儒学，一直到当代儒学的发展过程，再往前追溯到前现代，还有哪些资源，应该要重新去正视。我想有很多朋友也在做这个工作。

在 21 世纪的现在，中国经过了改革开放以后的进一步的发展，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到“经济发展、文化扎根”，已经从经济的进步，到整个军事、政治、文化，乃至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一个大国，慢慢进入强国阶段。它所面临的整个世界的地缘政治的崭新问题，很是麻烦，还是因为国际霸权竞争抗衡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陷入了严重的危机。这时候，儒学能够做些什么？这是我们应该去深思的问题。

我自己在做这些问题的研究里，大概想到了一个，总的来讲，是从整个人类文明的反思与疗愈，进而对 21 世纪文明病的治疗这个问题，大家应该共同努力，儒学、道家与佛教，都可以提供丰富的资源。就这个部分来说，儒学应该进一步地开发这样的资源，这有很多工作要做。我最为关心的是：如何让传统、经典的语汇，通过现代生活和现代学术的语汇，把它表述出来，真正展开深层的交谈与对话。

这就牵涉到，目前我们的学术研究多以哲学史的研究为核心，通常是以古代的话语直接作为概括，而没有真正地、好好地通过现代生活话语与现代学术话语来把它表述出来。这个部分我觉得是必须要花很多功夫的。这与整个学制的养成也是密切相关的，必须要有彻底的反省。

另外就是：重新正视现代性本身，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现代性？刚才黄玉顺教授提到了在后现代之后的现代性，那么真正的启蒙之后的再启蒙是什么？我想从整个启蒙运动发展到现在为止，这个启蒙显然没有真正完成。人类在启蒙过程中，又陷入一个更为严重的，如韦伯所说，一个严重的铁笼（iron cage）之中，这现代性看似理性，却陷入了另一个蒙昧状态。我们可以看到，

新冠病毒肆虐的这两三年，人类文明本身面临的不是文明，而是“文暗”，因为这个“明”而导致严重的“暗”，生命实存的存在是被封闭的，这被封闭的存在没有办法回归到存在本身，也无法真正回到自身来彰显其自己。这个部分，尽管在20世纪很多思想家，像海德格尔，或者许多批判理论的学者，他们很早就从各方面去思考到这些问题。但是进到21世纪，我想应该进一步仔细地、深刻地思考这个论题。

我认为，对于政治、经济等多方面而言，传统儒学有一些重要的概念可以重新去理解。譬如说，经济之为“经世济民”，政治之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正德、利用、厚生”等等。这些民国初年以来被批评为泛道德主义的东西，应该重新正视。其实，什么叫泛道德主义？真正回溯到“道”与“德”，道为根源，德为本性，真能做到如其根源，顺其本性，则条理畅达，生生不息。

我认为应该好好去正视整个儒学，要检讨现代新儒学，因为现代新儒学所含藏的西方近代性的主体意识太强，他们往往忽略了真正的儒学所处理到的完整性。儒学其实并不以本心论做主导，而是以心作为一个触动点，心是参赞点，而不是核心点。宋代的儒学就讲“吾儒本天，释氏本心”，我觉得这是可以重新再理解的问题。

我认为完整来说，儒学离不开天道论、离不开道统论、离不开心性论，这三只脚是要共同照顾的。然而当代儒学，现代儒学，我觉得他们太强调以心性做主导，不管心学派，还是理学派，都是以心性之论作为主导，而忽略了真正的、广大的共同体这个概念。这些年来我重新诠释“天地亲君师”，我认为这里隐含了四个共同体：天地是自然的共同体，血缘是人伦的共同体，君是政治社会的共同体，师是文化教养的共同体。人生于世上，离不开这四个共同体。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重新来理解这个论题。时代变迁，我们已经从“花果飘零”，慢慢到寻求“灵根自植”的年代。整个世界又回到了讲求文化的崭新年代，其实并不新，而是回到母源，重开生面的新。我们须得正视儒学原本的人伦、民本与自觉的重要性。

这些年来，我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想到把儒家的“人伦”与所谓的现代化的“人权”连接在一块儿，把“民本”与“民主”连接在一块，把“自觉”与“自由”连接在一块。我强调：有人伦的人权、有民本的民主、有

自觉的自由，这或许可以对西方现代所谓的民主政治，比如说欧美的政党政治已经面临的困境，提出些许讨论针砭。因为美国连一个枪支问题都没有办法妥善处理，这简直不可思议，很显然到最后他只有是“权力摆平”的问题，而没有“真正公平正义”的问题。我们在这里必须回到原先在我们华人世界之中，我们中国传统的正义论是如何的问题，中国原先对理性如何看待的问题，道德与理性以及其他种种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的问题。在这些问题里面，其实我们有机会反思，现代新儒学呼唤着要现代化，我觉得受到反传统主义的影响是非常深的。他们在谈很多问题的时候，其实是很委屈的，他们之所以委屈，是想委曲求全，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反传统主义者的声浪太大了，他们怎么说，已经形成风潮，你不顺着说一些，根本没有可能与他相抗。现代新儒家往往说：中国没有科学，只有科技；中国没有政道，只有治道。然而，这些说法基本上都是不准确的。中国传统政治当然有治道，也有政道，只是不同的政道而已。传统的科技当然也有科学，只是不同的科学，不同典范，不同时代，必须要有一个转折的过程。

前阵子，我还读到有一位先生提到余英时说中国没有神学，言下之意，好像少了神学是一种缺憾。其实不能这样理解，因为在我们的来讲，我们并没有一神论的神学，我们是多元而一统，归本于一的道学，这就是我们的国学的根本。须知：我们讲究的是“参造化之微、审心念之几、观事变之势”，孔子赞周易，做的就是这些。这是极为深奥的哲学，比起一神论的神学，当然大异其趣，但你说它不如一神论的神学。像这些似是而非，口耳之间传来传去，造成了一种错误氛围，形成了错误意识的视域，这些问题是十分严重的。我们必须提到更重要的高度，有更多人的关注，引发更多的热烈讨论。

如上所论，我认为“当代儒学”这个提法是重要的，因为当代儒学它不只具有现代性，而且有它的当下性，这当下性就是从古至今，从今继续往前迈进，以当下作为一个连接过去、开展未来的重要切入点。这里面有所谓的“接地气”，不只接地气，而且要“通天道”，进一步，要“入本心”，才能“布乎四体”，才能通达于八方。

就此来说，我认为整个中国文明到了一个崭新的年代，中华文明必须对世界文明有一些贡献。最重要就是我们应该好好地回归我们的传统理念，去开发我们经典中的和平的思维、和平的逻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

礼运·大同篇》)的思想也好,道家的“道法自然”也好,还有老子所说让百姓“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孔子所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些基本思想,如果全人类的文明能够往这边走,其实是很重要的。

譬如说,我们在国际上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外交发言应该要进一步提升,达到更高的视点、更宽的胸襟、更广的视域,既能接地气、通天道、入本心,又布乎四体、通达于八方,真正有一个泱泱大国的气度,才能够化解冲突。外交辞令必须注入一些新的东西,要不然的话,就会陷入以西方近现代发展出来的被权力与利益所主导的这样一个霸权的世界,一个霸权逻辑的终极看法里面我觉得这是非常麻烦的。我们儒学当下就得面对这样的当代性,而面对这些当代问题,就应该回溯古典而面对当下,从而有更多的发展可能。

当然哲学史的研究、儒学史的研究都是必要的,我们并不是认为儒学史、哲学史研究不必要,只是儒学史、哲学史的研究也必须用更多的现代生活话语、现代学术话语,而不是用古典的话语重说一遍。这一点包括整个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研究,都到了必须赶紧反思的时候了。

感谢《当代儒学》的邀请。这个会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十年,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始、壮、究”的过程,一个起点,就是始,进入壮,我们希望它有一个更好的发展,也希望有更多的学者能参与到这里来进行更多的讨论。我就说到这里,谢谢。